

## 广州非洲人的“汇款”特征及其功能研究\*

□陆继霞

**[摘要]** 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发现,在广州的非洲人主要通过邮寄商品而不是现金的方式给留守在非洲的家人,从而为改善家庭生计和当地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种独特的汇款方式,不仅使得家庭从经济上获利,而且使其家庭成员学得经商的技能,其意义比常见的流动人口现金汇款给家庭和社区带来的影响更富社会和文化内涵,因而在实践层面上对构建中非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非洲人;移民;南南合作;人口流动;汇款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8)03-0025-08

###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广州作为世界工厂中的南方城市,由于与非洲相似的气候条件、宗教多元性以及宽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等因素吸引了大量非洲人,<sup>[1]</sup>从而成为在中国的非洲人的主要聚集地。并且,由于饮食文化和宗教等因素,他们聚居在小北和三元里等地区。Bodomo 曾估算,在广州的非洲人有 10 万左右,<sup>[2]</sup> Mathews 则估计有二万人左右。<sup>[3]</sup>《广州日报》报道称,截至 2014 年底,在广州的非洲人有 1.6 万。而其他统计数字显示,2015 年 1~11 月经广州各口岸入境的非洲人约二十万人次,在广州市常住非洲人有 5208 名,<sup>[4]</sup>2017 年初,一些媒体报道称,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实际上仅有一万人左右。可见,目前在广州到底有多少非洲人,并没有统一的权威数据,这一方面与人口流动的特点有关,另一方面则由于签证等因素造成官方无法对其进行精准地统计。目前学界认为,相对而言,从出入境、住房登记等信息途径获得的数据更接近真实情况。与在西方国家不同,这些在广州的非洲人并没有正式工作而主要从事的是商业或贸易活动,<sup>[5]</sup>其经营的商品则从日常用品如衣服、鞋子,到家用电器和建筑材料等,多种多样、一应俱全。而且,他们在落脚城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社区,<sup>[6]</sup>即“巧克力城”<sup>[7]</sup>“非洲城”。<sup>[8]</sup>近几年来,“非洲人在广州”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对“广州非洲人”现象的研究除了从移民研究的主流视角讨论其身份是否为“移民”之外,重点集中在以下方面,非洲人移民到广州的原因,他们的居住、生活和经济状况,宗教活动及饮食文化,等等。

首先,一些学者对这些非洲人的生活和社会组织进行了研究。Robert Castillo 和 Adams Bodomo 的研究富有重要影响力,他们早期就对非洲人在广州构建自己的多民族小型社区的实践过程进行了研究,从而引起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广泛关注。<sup>[9]</sup>后来,牛冬通过对这些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居住方式和亲属关系等进行研究,提出了“过客社团”的概念,他认为广州非洲人并不会成为非洲到中国的移民,而只是“过客”,<sup>[11]</sup>黄石鼎<sup>[12]</sup>和王亮<sup>[13]</sup>对这些“过客”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社区的形成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后,强调指出非洲人在迁移过程中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重要性。Mathews 的研究则发现,那些在广州从事物流和中介服务的非洲移民不仅发挥着协调商业交易顺利开展的作用,而且还在中非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扮演着翻译人和传递人的角色。<sup>[3]</sup>

其次,这些非洲人与迁入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入问题是学界探讨的另一个焦点。部分学者指出,尽管这些非洲人在中国的规模不断地扩张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飞地,<sup>[14]</sup>但他们仍然面临着一些合法地位的问题。作为邻居,即使中国人已经习惯了非洲人的存在,但仍未完全接受这个群体。因受到自身洁净观、审美观等影响,一些中国人对非洲人仍会在一定程度存在歧视(牛冬. 广州非洲人的现状观察,360 个人图书馆,2016 年 4 月 29 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429/10/10155602\\_554729093.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429/10/10155602_554729093.shtml))。

\* 收稿日期 2017-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比较分析”(项目编号:16AZD017)。

大量的非洲移民仅凭持有过期签证而继续居住在广州,因而成为“三无”移民: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sup>[15]</sup>他们多居住在小北地区,通过从那些低档且不规范的房屋租赁市场以及附近的城中村去租房子,与那些国内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住在一起,<sup>[16]</sup>从而隐藏自己的非法身份。对他们来说,想要获得居住许可已经很难,更不要说合法的中国签证。<sup>[7]</sup>由于在广州生活过程中遭遇的一些困难,包括在很多方面被中国大众所歧视,他们的商业环境有时候会受到影响。<sup>[17]</sup>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广州非洲人的日常餐饮活动、功能、文化特性及对当地的影响,<sup>[18]</sup>宗教活动,<sup>[19]</sup>移民、<sup>[20]</sup>迁移、<sup>[21]</sup>迁居<sup>[22]</sup>等行为,社会空间、<sup>[23]</sup>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sup>[24]</sup>身份建构<sup>[4]</sup>等等,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本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广州非洲人的理解更多是在移民研究框架下对他们在广州工作和生活期间的社团组织、宗教活动、饮食等文化特性及其与当地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入等进行的探索和讨论,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这一新兴群体打开了一扇窗,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角上都对该领域的学术积累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这些研究文献更多是关于这些非洲人在迁入地的状况及对迁入地带来的影响,而关于他们与迁出地的联系以及对迁出地的影响却较少得到关注。由此,本文将从广州非洲人的汇款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将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

本研究的实地调查于2016年5月至2017年7月进行,主要是对广州的小北和三元里地区的非洲流动人口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在实地研究过程中,笔者还走访了非洲人在广州活动的各种区域,包括:宾馆、(交易)市场、餐厅、居住区以及那些与非洲人汇款相关的地方,如西方联盟(Western Union)、速汇金(MoneyGram)、商业银行、物流公司、外汇兑换所等。通过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访谈,笔者对被访非洲人所谈及的信息进行了交叉验证,并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在与留守在非洲的家人、与广州当地的生意伙伴以及在“汇款”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等之间的互动情况。本研究调研过程中共访谈22人,其来源国家、性别等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国家	尼日利亚	刚果	喀麦隆	马里	肯尼亚	赞比亚	加纳	埃塞俄比亚	合计
人数	7	1	2	4	1	1	4	2	22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注:本研究访谈和观察的对象均在广州已经居住1年以上,而那些通常因各种原因(如签证等)往返于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非洲商人则不在本研究讨论范畴之内。

## 二、广州非洲人汇款来源:多样的中非贸易生计活动

一般情况下,跨国人口流动都是那些从南方贫困国家流向北方发展水平较好的国家,<sup>[25]</sup>其驱动力在于这些国家对于低水平劳动力的需求。然而,这些非洲人在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中国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并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吸纳跨国流动人口,<sup>[15]</sup>非洲人来广州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商品在经营成本和价格上的优势与竞争力,因而从事中非之间的商业和贸易活动,即“为了赚钱”。Bodomo早期的研究曾指出,95%的非洲移民都是在经营生意,而其余小部分人要么是家属、要么是在非洲人的公司里做杂事。<sup>[2]</sup>

调研中笔者也发现,在广州的非洲群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到广州出差进行短暂停留、在购买货物后寄回非洲做生意的商人;另一种则是到广州后长期生活在这里,进行贸易的生意人,或为非洲人、中东老板提供服务的白领阶层(如房屋中介、电话卡销售等),或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第一种类型的非洲人通常居住在宾馆或与同伴一起住在市场附近,他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通常较短,大概1~2周,然后将货物通过空运或海运寄回国内,人们通常看见的那些在小北和三元里地区的市场里拿着大包、小包,装满鞋子、衣服、包等货物行走或者打车的非洲人通常是这种类型。而第二种类型的非洲人则是在城里租了房子长期从事各种生意的非洲人,尤其以西非人为主,如尼日利亚人和马里人,凡是在非洲人活动的场所——市场、敬拜中心或其他提供娱乐服务的场所,都有这两个国家的人。其他人数较多的则多来自塞内加尔、几内亚和加纳等国家。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多数是24~40岁之间已婚的年轻人,且男性居多。非洲人中少数的女性多是随丈夫生活在这里并协助他们做一些生意。

调研中发现,被访的非洲人中,并非所有人都特别清楚自己能来中国做些什么,但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机会”。所以,只要他们攒够了钱就会考虑跑出来,而最终将广州作为从事各种生活用品生意的基地,甚至包括大件的建筑材料等。

个案 1:Chris,25 岁,来自尼日利亚。2013 年来到广州,一直从事服装批发生意,他的商店位于被称为“非洲人购物乐园”的 CANAAN 市场,这里距离广州火车站较近,而且物美价廉、货物品种齐全。Chris 的商店周边既有中国人也有非洲人,关系都较好。他称,“很多非洲人都想来中国,打算碰碰运气。”在来之前,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做什么生意,到了以后才慢慢找到商机。他认为自己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挣的钱都是用来支持弟弟上学。他在家乡也开了一个商店,销售同样的服装商品——他自己创造的一个品牌,并且都从尼日利亚拿到订单后再从广州发货。

在广州,像 Chris 这样的非洲年轻人有很多。由于信息的流动,那些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移民通常喜欢选择同样的地点,他们甚至将中国当成了发展模范。为了能够让自己在广州落脚,一些非洲移民将普通话作为一种技能,以便为那些从事商业的非洲人从事翻译、导游和中间人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可以说是处于中非贸易网络的结构洞的重要位置。<sup>[26]</sup>这些非洲人会主动参加登封区“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为帮助这些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及开展生意而提供的中文课程。待“技能”成熟后,这些非洲人通常会在机场或宾馆招揽生意,以帮助那些非洲来的客户能够顺利到达他们需要去的地方,并且还会在中非生意人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帮助他们了解彼此的需求和商品的特点等,在确保交易保密的前提下,最终保证交易金额、交易时间、质量和数量等都能满足双方的要求。来自肯尼亚的小伙子 Arthur 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他游刃于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广州当地的老板及生产厂家之间,帮助他们成功签订合同,自己则从中获得交易总价百分之十的提成。此外,他还能够帮助预订宾馆、提供在宾馆和机场之间的接送服务等。事实上,由于那些来自非洲的商客在广州做生意的过程中通常会面临语言和环境等障碍,<sup>[2]</sup>这些掮客在其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可以帮助那些语言不通、商业和地理环境不熟悉而又存在文化震惊(cultural shock)的商客们及时地解决困难,以化危为安。<sup>[26]</sup>

现实中,在广州的非洲移民不仅忙碌于自身的生存问题,而且还使出浑身解数追求着自身的发展。例如,一些非洲移民会在一些公司里做些杂事,而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人则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甚至一些非洲人的商铺还会为非洲人和中国国内的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如店员或送外卖快餐等)。<sup>[18]</sup>另外,一些非洲人为非洲移民和中国国内的农民工提供服务,如理发、零售食品等。总之,在广州的非洲人从事的行业多是与中非贸易相关的各种商业活动或社会服务,并且过去几十年里,非洲人不仅通过实践证明了自己的商业技能,而且还开始为其他非洲人和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 三、广州非洲人汇款方式:非正式为主、正式为辅

广州非洲人为家乡汇款的方式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非正式的汇款渠道,二是正式的汇款系统。这些汇款途径及其具体的特点如表 2 所示:

表 2 广州非洲人的汇款方式

汇款途径	汇款方式	特点
1 朋友或熟人捎带	让那些从非洲到中国做短期生意的朋友带钱或者商品回去。	非正式、基于高度信任
2 熟人兑换	非洲移民让那些来中国做生意的老乡将钱给自己在非洲的家人,而他则负责在这边将等额的钱帮助老乡支付购买商品的费用。	非正式、基于高度信任
3 哈瓦拉(Hawala)	阿拉伯国家和印度次大陆的一种传统汇兑体系,由(在广州)经手人收款后、指定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合伙人向(非洲移民的)家人付款,需要付较少利息。	非正式、手续费低、高风险
4 西联 (the Western Union)	汇款者需要提供有效证件,包括护照、驾驶证等,填写汇款表,其中包括很多细节内容:国家、邮寄数额(美元)、接收的货币种类、金额、转账的目的等。以 200 美元(合 1 378 元人民币)汇款为例,到非洲国家大概需要 19.5 美元(合 134 元人民币)手续费	正式、手续费高、快捷、可靠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的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通常情况下,这些非洲人都不是选择单一的方式进行“汇款”,他们一般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将经费带回非洲。但只要存在可能,他们都不愿意选择正式的汇款方式,因为那样手续费太高,相比之下,他们更倾向于上述

那些手续费较低甚至没有手续费的非正式的汇款途径。

#### 四、广州非洲人汇款背后的文化解读

如上所述,在广州的非洲人由于看到了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并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做生意和生活的路径,因而能够“扎根”在广州,并且获得收入以支持在非洲的留守家庭或自己的投资项目。已有文献表明,跨国流动人口对其迁出地国家的贡献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便是通过汇款,即通过现金流的方式来改善“留守人口”的生计状况。Adams 和 Page 曾指出,跨国流动人口及其汇款仅次于外国直接投资而极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水平和贫困深度。<sup>[27]</sup>然而,如此重要的汇款却在国际资金流动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sup>[28]</sup>事实上,在广州的非洲人与其他流动人口一样,也会将劳动力、技术和技能等从迁入地通过汇款、投资和引入知识、技能等方式传递给迁出地。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又是如何对其留守家庭进行“汇款”和支持的呢?本研究发现,广州非洲人的汇款不仅包括少量的现金流,而且更普遍的是通过汇物的方式,这不仅可以增加留守家庭的收入、改善其生计,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其家庭成员从商的技能,促进广州非洲人与留守家庭成员及社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传递中国文化等,从而使得“汇款”具有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含义。

##### 1. 经济功能

从经济上来讲,流动人口为其留守的家庭成员汇款主要是为了支持家庭成员的生计问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家庭都是从海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持,然而,非洲国家作为迁出国,由于官方记录的汇款流量占全球汇款比例比较低,所以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注,<sup>[29]</sup>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2年由1.4亿移民海外的非洲跨国流动人口汇款给非洲的金额高达600亿美元,<sup>[30]</sup>但该数据仍未包括那些广州非洲人以实物的形式进行汇款的价值。

对于在广州的非洲人到底为其留守家庭汇款多少,是很难估量的。而且,调研中笔者发现,这些跨国流动人口为本国的汇款并非用于过度消费及非生产性投资(如汽车、衣服等),而是除了用于日常购买食物、支付药费外,主要用于投资农业生产、做小生意以及教育和修缮房屋等家庭的维持和再生产活动。

被访者称,在广州的非洲人大多都是已婚,并且在非洲有留守家庭。根据非洲的文化传统,户主和家庭责任一般都落在男性身上,<sup>[31]</sup>即便男性外出务工或移民,家庭成员和社会依然期待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在支撑家庭,包括购买食物、衣服,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改善住房、家庭人员的卫生保健费用以及其他开支。本研究中访谈的非洲人,每月寄给家中的费用平均为3000元,有时候因为家中急需则会再多寄一些。而那些教堂里的牧师则称,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经常提醒这些非洲人要与家人密切保持联系,并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事实上,这种在迁入地的教堂参与移民的汇款行为现象并非个案,Hagan 和 Ebaugh 的研究中就指出了,在美国的移民会受到自己归属的宗教团体的影响而确保自己能够与迁出地保持联系,甚至有时候教堂还会组织教徒们捐款以资助一些成员家里的婚礼、葬礼等特殊事件时的经济之需。<sup>[32]</sup>本研究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广州非洲人作为家庭成员之一,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来支持非洲留守家庭的经济活动,此外,还会参与其家庭和社区活动的各种决策。然而,不同于一般的跨国移民,通常他们汇款回家的是货物而不是现金。从而,其家人能够销售这些商品,赚钱后用于支持家里的各项开支。虽然大家都是将东西寄回家,但数量、频率和目的却不尽相同。这些非洲移民为家庭邮寄货物的方式通常取决于规模的大小。数量较大的客户通常选择海运,因为价格相对更低,但时间较长,而那些邮寄小件的客户则选择空运,因为速度更快。

##### 2. 社会功能

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流动人口在外期间,对其迁出地的家庭成员和同辈群体会进行各种关于迁入地的生活、文化及其他方面信息上的交流。<sup>[5]</sup>事实上,这种在思想、生活方式和信息等方面文化上的交流就是所谓的“社会汇款”(social remittances)。从广义上讲,它指从迁入地流向迁出地国家或社区的“思想、行为、身份与社会资本”。<sup>[33]</sup>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息的流动也会在流动人口内部进行传递,从而有助于解决他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住宿、商业机会、工作等问题。<sup>[34]</sup>

大多数被访者都表示,因为生意上的事情,他们每天都会通过 Whatsapp 或 Skype 等视频聊天软件与家人保持联系,与此同时,还会沟通彼此的生活经历和重要事件,而现代信息沟通技术使得他们这种“感觉自己同时生活在两处(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家乡)”的“同时性”<sup>[35]</sup>成为可能。基于此,这些非洲人不仅能够对非洲家庭每天发生的事情参与决策,而且其所在的社区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参与村里的一些大事。

个案 2:来自肯尼亚的 Mosh,当其在家乡的父亲去世时,她在广州的教堂里与伙伴们分享其故事和感受,结果,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经济上她都得到了非洲同伴的支持,进而使得其家乡能够为其父亲顺利地举行葬礼。

除了通过上述现代流行的信息沟通工具与家人保持联系外,这些非洲人还通过本国的跨国流动人口联合会之类的网上非正式组织彼此保持联系,从而在这些平台上共同讨论与家乡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等相关的事务,进而参与当地的政治与社会治理进程。

为了与家人或者客户取得联系,购买和使用电话卡是必须的。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营业厅办理业务时,通常要求用户使用护照等证件进行实名登记。然而,由于大多数广州非洲人并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因此,他们通常在那些由非洲人经营的黑市上购买 SIM 卡,以逃避因为文件检查而暴露自己身份和行踪的风险。这些非洲人通过智能手机或者电脑网络与家人取得联系,从而才能够每天参与家庭事务的决策,包括为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做广告、制作和接收订单等,Facebook、Twitter 等现代沟通技术对于这些非洲移民来说必不可少。尽管根据中国政府对网络的规定,运用防火墙等禁止对 Facebook 等一些软件的使用,但实际上,非洲人通常会翻越“防火墙”而使用其习惯使用的这些软件。而广州市却有人专门从事为这些移民的手机和电脑提供安装 VPN 的服务,其价格从 30~100 元不等,生意火爆。只要这些非洲人落地广州,那些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就会主动找到他们,提供上述这些通讯服务。

正是由于这些在表面上为经济汇款之外的频繁的日常互动,这些广州非洲人在中国居住多年后,不仅自己的行为发生了些许改变,而且也影响着家人的行为有所变化。例如,一些被访者称,他们通过日常互动和交往发现中国人无论挣多少钱都有储蓄的习惯,而非洲人则是有多少花多少,二者形成了强烈对比。渐渐地,他们也学会了中国人储蓄的文化,并且将这种想法传递给起家人,并进而改变家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

Frank 在广州工作了 6 年,做生意,他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在他的商店里有一位来打工的非洲女孩,她每个月 2 500 的工资除了交房租和日常花销外,还要定期寄给父母一些,其余剩下的钱都会存进银行以备应急之需。结果,过了三四年,她不仅学会了如何与中外不同客户之间做生意,而且还攒够了自己做生意的资本 6 万元。在 Frank 看来,以往非洲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其身边有些朋友在广州工作几年后,都是拿着赚到的钱和习得的“生意经”回国和家人一起发展去了——或做生意或开工厂。

### 3. 技能学习

如上所述,在广州的非洲人通常为家庭邮寄货物而非现金,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经商和管理的技能传授给了非洲的家庭成员。被访者称,与其在汇钱的时候交付转账费,还不如为家乡有需求的客户购买一些货物,让家人学会了经商、能够直接销售,也能帮助家乡的人满足生活之需。

个案 3:Paul,来自科特迪瓦,于 2011 年底来到广州就职于一家肯尼亚的国际货运公司,并且获得居留许可的权利。他将自己的收入购买各种商品汇给自己的家人,如女包、鞋子,男性服装,等等,从而使得家人获得收益。起初,他只是随机地寄回一些商品,但后来渐渐地依靠妻子在家里收到的订单来发货。例如,他邮寄回去的男性衣服每套成本价为 150 元、共 10 套,手包每个成本价 50 元、10 个,这样子寄回家的话,成本价才 2 000 元,但是他的妻子可以销售 4 000 元,结果算下来,他实际汇给家里的费用是 4 000 元,比他寄回去 2 000 元要更加合算,价格翻倍。Paul 邮寄商品回国通常是通过空运。其前提是每次邮寄不低于 45 公斤的货物,否则航空公司会加收一笔“小包裹费”。空运的成本费是每公里 40 元人民币,对于 Paul 来说,45 公斤的货物将花费大概 1 665 元人民币的邮寄费。估算下来,每个月他给家里大概邮寄 100 公斤的货物,还是比单纯汇款现金更加合算,但只要是可能,他都会让熟人将商品带回给家人。Paul 给家里的汇款主要用于支付家人的房租,其他少部分费用则用于健康、食物和孩子的教育费用,如书本费、校服和一些杂费。此外,妻子还需要支出一些人情费用,如参加葬礼等。

一些被访者称,他们也不是都往家里邮寄大件的商品,有时候会寄一些小玩意儿给家人解决问题。

个案 4: Peter, 28 岁, 尼日利亚人。2015 年随其叔父来到广州, 协助他经营与 IT 相关的生意, 如电话、U 盘、硬件和其他一些计算机零件等, 当其叔父后来将生意转战到义乌后, Peter 并没有跟着去, 而是留在了广州, 因为经过一年的光景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经营与电话和电脑相关的电子产品。Peter 由于没有结婚, 其主要负担在于支持家中上初中的弟弟上学。因此, 他将广州购买的手机(大概 2 000 元人民币, 合 290 美元)寄回家中, 然后, 弟弟在家乡销售的价格大概是 400 美元(合 2 760 元人民币)。有的时候, Peter 也会让那些家乡来做生意的人带回手机给家中的弟弟, 让弟弟销售。之所以相信这些人, 是因为他们在广州做生意的时候自己也会帮助他们, 可以说, 彼此之间是一种高度依赖和信任的关系。

可见, 这种通过邮寄货物而非只是现金的“汇款”, 实际上不仅培养了家庭成员开展商业活动的相关技能, 以进行小规模的国际贸易, 而且还为家庭成员创造了就业机会。

## 五、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 在广州的非洲人给家人的汇款具有明显的特点, 即汇款内容包括现金或实物等方面, 汇款方式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渠道, 但通常情况下, 他们的汇款是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混合的方式“邮寄”物品(商品)为主。这种汇款方式, 不仅对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发挥了作用, 而且还对其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换句话说, 这不仅对非洲国家的留守家庭、社区甚至是国家做出了经济上的贡献, 而且还在文化和技术上进行了“汇款”。他们教会家人从事小生意并且进行储蓄的行为, 不仅有助于家庭维持和改善生计, 而且还为其未来的需求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此外, 他们虽然人在他乡, 但一直通过现代通信技术保持与家庭、家乡的各种联系, 参与其家庭决策, 甚至是当地的政治与经济事务。这些都是未来非洲人在中国积累一些资本后回国进行投资和创业的重要基础。此外, 在“汇款”的过程中, 这些非洲人一直与自己的家人和社区保持着联系, 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全然断裂或弱化反而是维持和加强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 这一点与姜飞等学者的研究结论<sup>[4]</sup>是不同的。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 中国地方媒体对在华非洲人的刻板化的负面报道对非洲人的身份进行了建构, 一方面夸大了非洲人群体的数量, 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他们对中非贸易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目前媒体或者一些研究中所讲的广州非洲人与当地人之间所存在的排斥、厌恶甚至是隔离的关系并非现实生活的全部, 事实上, 广州非洲人与中国国内那些农村到城市的务工者之间存在着互助、友好的盟友关系, 并且非洲人和广州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交流的增加逐渐在改善。

如果超越广州非洲人这个话题,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在全球化的今天, 南南国家之间人口流动的规模虽然还缺少权威的官方统计数据, 但从经验性的观察来看, 其趋势是这一类型跨国人口流动的规模正在日益增加, 尤其是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开启之后, 中非国家之间官方的各种合作、贸易和投资开展得如火如荼, 中国人在非洲与非洲人在中国的现象都日益凸显。不容忽视的是, 其中除了大量正式的、官方的南南合作项目之外, 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就是非官方的、非正式的跨国人口流动。在中国的非洲人虽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非洲国家, 并非同质性的群体, 但他们来到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即为了谋求生计并投资于家乡的农业等产业发展。事实上, 这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非洲人同那些频繁往来于中非国家之间的生意人一道, 对未来中非国家之间的关系构建以及双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促进了珠三角的制造业发展、有效地缓解中国产能过剩、为非洲输入中国制造的产品以满足当地需求,<sup>[36]</sup>以及传递和交流中国文化等。然而, 目前, 无论是迁出地的政府还是迁入地的政府, 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 对这一新兴的社会现象尚还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客观地评估。与目前大量研究和成果聚焦在“非洲的中国人”相比, 对于这些“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存在及其影响的关注和研究尚显得不够充分。

从长远来看, 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将会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到中国, 其中从事这种小规模的非政府间合作的商贸活动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简单地将这些群体统一标签化为“三非”的干预措施和手段只能粗暴地驱赶这些非洲人离开广州而去其他管理相对宽松的城市(如义乌)或者返回国内, 从客观上讲, 这并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而容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因此, 本研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政府和学界对那些在中国的非洲人群体进行更多的关注和理解, 从而引导公众更加客观公正地认识全球化背景下南

南人口流动的现象及其意义,另外,也有助于地方政府适当调整其策略从而对跨国流动人口进行更加切实有效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如在签证办理、社会融合、汇款管理等方面进行适宜管理的同时,也能够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这将从另外一个层面为中非友好关系和中非合作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致谢:感谢 2015 级来自马拉维的硕士生 Richard Kadongola 为本文提供的部分调研资料

[责任编辑 秦红增] [专业编辑 徐 薇] [责任校对 卢 韬]

### [参 考 文 献]

- [1]Lan, S., Transnational business and family strategies among Chinese/Nigerian couples in Guangzhou and Lagos[J]. *Asian Anthropology*, 2015(2).
- [2]Bodomo, A., The African Trading Community in Guangzhou: An Emerging Bridge for Africa – China Relations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0(203).
- [3]Mathews G., African Logistics Agents and Middlemen as Cultural Brokers in Guangzhou[J].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16(4).
- [4]姜飞,孙彦然. 跨文化协商”:广州非洲裔移民身份建构研究[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 [5]Liang, Z., Chunyu, M. D., Zhuang, G., & Ye, W. Cumulative Causation, Market Transition, and Emigration from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8(3).
- [6]Bodomo, A., African Diaspora Remittances are Better than Foreign Aid Funds: Diaspora – driven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J]. *World Economics*, 2014(4).
- [7]Castillo, R., Feeling at Home in the ‘Chocolate City’: An Exploration of Place—making Practices and Structures of Belonging amongst Africans in Guangzhou.[J].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4(2).
- [8]Li, Z., M. Lyons & A. Brown., China’s ‘Chocolate City’: An Ethnic Enclave in a Changing Landscape[J]. *African Diaspora*, 2012(1).
- [9]Bodomo, A., Africans in China: A Socialcultural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 China Relations[J].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2012(1~2).
- [10]牛冬.“过客社团”:广州非洲人的社会组织[J]. *社会学研究*, 2015(2).
- [11]牛冬.“过客家户”:广州非洲人的亲属关系和居住方式[J]. *开放时代*, 2016 (4).
- [12]黄石鼎. 在穗外国人生活状况调研报告[A]. *广州社会发展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3]王亮.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非洲人社区的生成及演进路径 —— 以广州小北非洲人社区为例[J]. *青海民族研究*, 2017(2).
- [14]Mathews G. & Yang Y., How Africans pursue low—end global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J].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12(2).
- [15]Liang, Y., The causal mechanism of migration behaviors of African immigrants in Guang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mulative causation theory [J].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 2014(1).
- [16]Zhou, M., Xu, T., & Shenasi, 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terracial dynamics: a case study of self—employed Africans and Chinese in Guangzhou, China[J]. *Ethnic & Racial Studies*, 2015(9).
- [17]Bork—Huffer, T., Healthcare—Seeking Practices of African and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Guangzhou[J].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15(4).
- [18]马恩瑜. 从广州非洲人餐饮活动透视其文化特性[J]. *非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19]马恩瑜. 在非华裔群体基督教活动研究[J]. *非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20]梁玉成. 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累积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3(1).
- [21]许涛. 非洲商人迁移广州的行为特征分析[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 [22]柳林. 在粤非洲人的迁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广州、佛山市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1).
- [23]李志刚.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J]. 地理学报, 2008(2).
- [24]许涛. 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J]. 青年研究, 2009(5).
- [25]Cissé, D. South—South Migration and Sino—African Small Tra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in Senegal and Africans in China[J]. *China and Africa( English version)*, 2013(8).
- [26]周大鸣, 许多天. 结构洞视角下在穗非洲导购中介商社会网络研究[J]. 民族研究, 2017(3).
- [27]Adams R. and Page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duce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05(10).
- [28]Yang, 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Philippine Migrants’ Exchange Rate Shocks”. Working Paper No. 02—11 of 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5.
- [29]Cisse, D., 丁金宏, Coulibaly, M., 等. 非洲的移民汇款及其对国家发展的作用.[J]. 世界地理研究, 2008(3).
- [30]World Ban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2012 No. 1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31]Akanle, O., Adesina, J. O., & Nwaobiala, U. R. Turbulent but I must endure in silence: Female breadwinners and survival in Southwestern Nigeri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16, 2016.
- [32]Hagan, J. & Ebaugh, H. R., Calling upon the sacred: migrants’ use of religion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3(4).
- [33]Levitt, P. and Lamba—Nieves, D. , Social Remittances Revisited[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11(1).
- [34]Hirschman C.,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Origins and Adaptation of Immigran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4(3).
- [35]Paragas, F., Migrant workers and mobile phones: Technological, temporal, and spatial simultaneity[J].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and time: Mobile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2009(1).
- [36]甄静慧. 非洲黑人在广州[J]. 南风窗, 2009, (19).

[作者简介] 陆继霞(1977~), 女, 黑龙江嫩江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与国际发展。北京, 邮编: 100193。

##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Remittance for Africa by Africans in Guangzhou

LU Ji-xia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As a part of the South—South migration population, Africans went to Guangzhou since 1990s to carry out business and trade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Africans in Guangzhou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their family livelihoods and local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sending commodities rather than cash to their left—behind families in Africa. Such a unique way of remittance not only benefits their family economically, but also enables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gain business skills. It brings more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to those left—behind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in Africa than cash remittance usually conducted by migrant population does, therefor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at practical level.

**Key Words:** African; immigran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migration; remittance